

关于侨易辩证关系的断想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读后

顾 钧

侨易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因侨致易，简单来说就是个人或群体因为物质位移而产生精神质变。所以这一理论对于近代世界的各种现象更具有解释力。15 世纪末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人口迁移、文化碰撞、观念融汇的速度大大超越了古代，典型的侨易现象如移民、留学、传教、驻外也越来越司空见惯。叶著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是非常可贵的努力，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叶隽在该书下编《案例研究》中讨论的个案也以近代中国留德学人为主，说明他把自己理论的解释范围大致划定在近代的中国与世界。近代的侨易现象无疑是很多的，但古代是否也有呢？庄子在《逍遥游》中写大鹏自北冥徙于南冥，“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真可谓汪洋恣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当他的笔锋转向人间世，写到当时人们外出旅行的情形，却是“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时代的一千里，大约相当于现代喷气客机半小时的航程，为了走过这么一段距离，包括做准备在内，竟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在那样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侨的几率和范围自然要小得多。古代中国除了法显、玄奘、长春真人等少数学者有机会长风万里之外，大多数士人的足迹不出于禹域之外。但禹域内的游历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早年的诗作不免仍以藻绘为工，而到 46 岁入蜀从军以后，诗风发生很大变化，抗金前线火热的战斗生活和巴山蜀水的新环境让他从人到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诗家三昧忽见前，屈（原）贾（谊）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后来他

又总结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示子遯》）他本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却将诗集名为《剑南诗集》。如果株守故乡，就很可能失去许多发展的机会。另外，由于战乱、朝代更迭而产生的侨则更容易给人带来本质性的变化。南渡后的李清照能够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夏日绝句》）这样豪放的诗句，在她早年是不可想象的。

庄子又有著名的“坐井观天”的寓言，用侨易学的观点来看，物质位移的限制无疑大大影响了精神的质变。但一个人即使不发生空间移动，同样会有精神的变化，因为人不仅生活在空间中，也生活在时间中。逝者如斯夫，时间流逝给人带来的变化有时超过空间的变化。所以侨是否只局限在空间范围，而不纳入时间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古代的中国人基本上生活在四海之内，但这并不代表其他民族也安土重迁。同样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犹太人命运多舛，希伯来文明也成为最漂泊的文明。公元70年，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罗马士兵焚毁后，他们被迫流散到欧洲、非洲，进而流散到世界各地，但是，尽管他们的流散足迹越来越远，区域越来越广，他们的民族性并没有消失，他们无论流散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极力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仪式，并且严格在族内通婚，在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流亡后，他们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被异族同化，反而于1948年复国，可谓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奇迹对侨易学的意义在于，一个发生了巨大（或者说最大）空间位移的民族，却没有发生精神位移。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现象？早在1790年代，康德在思考人类历史规律时就注意到了这个流浪的民族。今天我们在建构侨易学理论的时候仍然不应该忽略这个古代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它至少说明，侨与易之间并不是一种正比例关系。

流散（diaspora）无疑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侨易学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两千年来犹太人有家难回的痛苦历程作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流散现象值得从侨易学理论上做深入的研究。

其实，犹太民族在流散的过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改变。他们作为一个族群确实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做到这一点。据记载，中世纪流亡在西班牙境内的一些犹太人，为了逃避被驱逐、屠杀和卖作奴隶的命运，不再遵守星期五的休息，不再举行割礼，而是接受洗礼，成为所谓“马拉诺”（Marrano），或“新基督徒”，此后他们可以参加当地的一切活动，少数人甚至上升为领导阶层。

犹太人在向全世界流散过程中也来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开封犹太人，一般认为他们最早一批是北宋中叶来到开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犹太人没有像他们

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胞那样保留住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性，而是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到19世纪下半叶，开封犹太人的相貌、衣着与汉、回等族人民已毫无二致；在宗教、习惯方面，他们完全接受和遵循中国人祭祖、丁忧、婚丧嫁娶等礼仪；他们固有的语言消失了，连姓名都改了。总之，他们完全被中华民族所同化。

犹太人在欧洲和中国的精神变化提醒我们，易可能是群体性的，也可能是个体性的。侨易学应该给予群体侨易和个体侨易以同样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游离于群体的个体的侨易。

中国文化确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在历史上，它不仅包容和同化了犹太文化这样比较小规模的外来文化，对于像佛教这样大的外来文化同样表现出了强大的同化力。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产生，说明印度佛教不是征服了中国，而是最终被中国征服，成为中国佛教。另外，中国历史上外民族入侵中原后，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政治上虽然可以建立政权，但文化上却完全缴械。所以中国古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变化基本上以“非汤武，薄周孔”、出家当和尚为限。

更大的精神质变发生在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文化的入侵确实造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在近二百年所发生的精神变化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由器物到制度，进而至于精神领域。他们最终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乃至全盘西化的激进口号。

喊出这些最激烈口号的基本都是留学生，在他们身上因侨致易现象是彰明较著的。但是，作为个体，并不是每个人都因为留学西方而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最著名的如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清朝灭亡后还拖着辫子，至于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的“妙喻”早为大家熟知。又如严复，留学回国后不仅花钱捐了监生，还前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晚年思想更加保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要求学生读经。到了五四一代，虽然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实际行动却没有那么大的变化，甚至没有变化。喊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胡适接受了包办婚姻，并且和江冬秀终身厮守。鲁迅主张打破大家庭的束缚，但1919年却花大价钱买下八道湾住宅，将全家老小团在一个屋檐下。

近代是中国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在学者们身上也不难发现易与不易的杂糅。王国维最早用西方的理论解读《红楼梦》，率先使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可谓极新，但在思想上却极旧，一生以帝师为荣。陈寅恪在国外留学13年，回国后开讲“西方的东方学”课程，进行梵汉对勘的研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但他自叙

内心世界却是“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钱锺书饱读英、法、德、意多国文学，但著书立说却使用为五四学人所唾弃的文言文，采用的文体还是《困学纪闻》、《日知录》一类的读书札记。可见这些新式人物只是部分的新，不少旧的东西依然留存在血液中。也就是说，他们在因侨致易之外还有不易的东西在。这提醒我们，就一个人来说，侨与易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复杂的，易与不易的关系以及背后的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并做理论上的思考。

上文的几段文字想说明3个问题：（一）侨易现象虽然集中在近现代，但古代也有；（二）有群体侨易，也有个体侨易，个体有脱离群体的情况；同时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因为侨居地的不同，其精神变化也是截然不同的；（三）就个体侨易来说，有因侨致易的情况，但也有不易的成分；同样，就群体来说，也有因侨致易和不易情况。总之，我想说明的是，侨与易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古代、近代、群体、个体，以及个体内部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侨易关系，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叶隽在定义侨易现象时写道：“我们并不能将所有的物质位移的现象都称之为侨易现象，那样就太过泛泛了，因为不发生质性文化差结构物质位移的精神位移或质变，也是普遍存在的，作为一种普遍性哲学思维的侨易学可以讨论这样的大问题，但作为一个具体学科的侨易学却必须限定自己的学术范围。而且即便是在似乎绝对封闭的空间范围之内，也有所谓的相对运动一说，我们不能以一种孤立的、绝对的、不变的思维来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所以我倾向于将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联合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作为严格的‘侨易现象’。具体言之：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并且最终完成了侨易主体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侨易现象’。它是侨易学研究的主要对象。”^[1]对照这段定义，上文所列出的一些现象或许不是典型的侨易现象，而属于普遍性哲学思维的侨易学的范围，但我希望这些现象对于叶隽所定义的狭义的侨易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但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就在于它超越个别现象，寻求普遍规律。它的超越性越强，理论性也就越强，适用的范围也就越广泛。狭义的侨易学可以设定自己的范围，而广义的侨易学应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凡是与侨易有关的现象都可以纳入考察的范围。实际上，广义和狭义只是相对的，就像坐在原地不动似乎是没有发生位移，但地球无时无刻不在转动；至于精神的变化，量变和质

[1] 叶隽：《变创与渐变：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变之间也很难做出精密的区分。

叶隼提出的理论或许有一些不严密、不周详的地方，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理论一样。因为人类社会实在太过复杂，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够洞察一切（即使是划定了某个范围）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歌德早就说过，理论是灰色的。但理论家们面对如此灰色的前景却仍然前赴后继地努力着，这种勇气和执著是让人赞叹的，对于一个中国理论家来说，就更加让人钦佩。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和理论建构。但这只应该成为历史，当下的中国需要理论，需要理论的指导。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西方理论的进口和消费大国。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这一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的理论失语状态显然与已大大提升的国力不相适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叶著的意义就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叶隼利用本土资源（主要有古代的《周易》和近代的侨学）所进行的理论创新，说明 70 后的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相信该书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将逐渐显露出来。